

阿根廷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 及其政治影响

——以自由市场（Mercado Libre）为例

袁梦琪*

摘要：新兴技术的兴起、经济的发展、社会基础的变迁和相应政策的支持，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这些变化对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和政治运行方式产生影响，也对当代政治学许多现有的基础性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兴起使原本的公共治理的主体出现了变更，影响了传统的权力运行机制，更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空间。面对这些变化，本文通过对阿根廷最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自由市场”的案例进行分析，提出国家在数字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治理精神，鼓励协商合作、改进监管理念、改善政治吸纳，从而应对新发展带来的政治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国家与社会关系；权力结构；拉丁美洲

一、引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支撑的生产方式革新了各个国家的行业发展，其中许多新兴

* 袁梦琪，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后。

企业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核心带动行业内部的运行模式，原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许多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和政治运行方式产生影响^①，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挑战了政府现行的监管体制，触发了治理变革。这些变化对当代政治学中许多既有的基础性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能力和治理方式等方面。2021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接近63%，有近49亿人口可以接触到互联网^②，个体行为方式和社会互动关系都将被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效应改变，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表现出的蓬勃发展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它们逐渐渗透了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日常生活，对民众的行为方式具有“润物细无声”般的改变。由此所产生的崭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都成为改变新型社会规则和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互联网技术驱动下形成的平台经济，制造出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领地”和新型“政治空间”，进而可能彻底改变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③

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以大数据等现代化工具为支撑的、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新兴企业；它们能将相互依赖的不同群体集合在一起，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能进行点对点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价值创造互动。^④这些企业往往拥有多种类的商业产品，能够发展出灵活多变的商业形态，形成以对客户服务为中心的商业模

① 李凌：《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管制模式变革》，《经济学家》2015年第7期，第27—34页。

②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21”, p. 1,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FactsFigures2021.pdf>.

③ 樊鹏：《利维坦遭遇独角兽：新技术的政治影响》，《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第134—141页。

④ 王璐、李晨阳：《平台经济生产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21年第6期，第53—61页；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第4—17页；Geoffrey G. Parker, Marshall W. Van Alstyne & Sangeet Paul Choudary,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6。

式。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触角往往能深入到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的生活空间中。互联网平台企业不仅仅是信息服务提供商，它们往往还掌握了先进的信息获取和分析的技术，提供了整个经济生态系统，并使得系统中的其他企业都依附于平台企业的信息服务。^① 平台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权力关系，给社会带来了深度变革。学界有关美欧发达国家中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度卷入政治生活的文章已有很多，主要聚焦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对民主制度及选举结果的影响^②，但是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模式尚未实现完全制度化的发展中国家^③，需要更多关注的则是如何思考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所带来的超前于现有政府管制体系的问题。

本文认为，需要审慎地考察和分析互联网平台企业所带来的国家

-
- ① Pepper D. Culpepper & Kathleen Thelen, “Are We All Amazon Primed? Consu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2, 2020, pp. 288-318.
- ② 相关文章，例如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Google、Facebook、Twitter、Amazon等）的政治影响和选举影响的正面或负面效应研究，见 Francis Fukuyama, “Making the Internet Safe fo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2, No. 2, 2021, pp. 37-44；Samuel Woolley, “Digital Propaganda: The Power of Influenc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3, No. 3, 2022, pp. 115-129；Dipayan Ghosh & Ramesh Srinivasan, “The Future of Platform Power: Reining in Big Tech”,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2, No. 3, 2021, pp. 163-167；Pepper D. Culpepper & Kathleen Thelen, “Are We All Amazon Primed? Consu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2, 2020, pp. 288-318；Michael Bossetta, Anamaria Dutceac Segesten & Hans-Jörg Trenz,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Facebook during Brexit: Does user engagement on media pages stimulate engagement with campaign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 17, No. 2, 2018, pp. 173-194；Giovanni De Gregorio, *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 in Europe: Reframing Rights and Powers in the Algorithmic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等。
- ③ 也有一部分文章讨论过大型互联网平台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活动影响，但大多数集中于选举结果或民众游行，较少会涉及更为深入的国家-社会关系或权力结构变迁的问题，见 Larry Diamond & Marc F. Plattner (eds.), *Liberation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Manuel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5；Ivo Furman & Asli Tunç, “The End of the Habermasian Ide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7 Turkish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Policy & Internet*, Vol. 12, No. 3, 2020, pp. 311-331等。

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和权力结构的变革。本文以拉美当前发展最为迅速和规模最为庞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自由市场”(Mercado Libre)为例,该企业于阿根廷落地,如今在拉丁美洲18个国家均占据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首位,连接着拉美2.9亿人,超50万拉美中小企业在该企业提供的平台上进行交易活动。^①因为阿根廷是该企业的诞生地,同时该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经历了与不同执政党政府的磨合期,在拉美地区具有典型性,所以本文选择对该企业在阿根廷的案例进行解读,分析该互联网平台企业在阿根廷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从而以社会力量的视角来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深度有效地变革和改善其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

二、阿根廷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概况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技术基础,近年来,阿根廷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蓬勃发展,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网络层面的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促进中心(Cipdh)2022年1月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阿根廷网络普及率达到80.2%,在拉美国家中居于首位,^②明显高于全球平均的41%。^③随着阿根廷通讯基站建设规模的扩大和道路基建的完善,自2015年以来,不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家庭层面,移动网络和固定网络的接入数量一直稳步增长。^④阿根廷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的移动网络接入数量比率达到73.8%,固定网络的接入数量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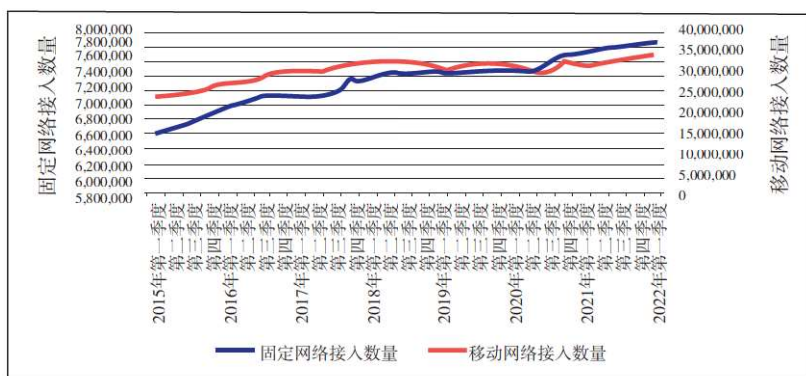
① MercadoLibre, Inc., “Reporte de Impacto 2021”, p. 8.

② “La Argentina es el país con mayor penetración de internet en la región, según la Unesco”, *télam*, January 20, 2022, <https://www.telam.com.ar/notas/202201/581436-conectividad-internet-unesco.html>.

③ Individuals using the Internet (% of population) 2015-2017, The World Bank (2017),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T.NET.USER.ZS?end=2017&locations=AR-1W&start=2015>.

④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已知数据。

达到 16.7%。^① 民众拥有更便捷、更快速的网络获取路径。从 2010 年教育部发起的平等连接计划（Conectar Igualdad），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发放计算机和提供教师在线备课的虚拟教室系统^②，到阿根廷联邦光纤网络（Red Federal de Fibra Óptica）现代化的计划，阿根廷的光缆线路总长度已经达到 31 876 公里，约 2075 万阿根廷人可使用宽带，阿根廷国家卫星公司（ARSAT）在 6 个省份已签署 8 份协议，承诺为偏远村镇的居民提供互联网光纤接入^③，有助于消除阿根廷社会的数字鸿沟。至 2022 年 6 月，5G 网络已在阿根廷的重要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罗萨里奥市成为现实。^④ 互联网平台经济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得到了有力支撑，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



数据来源: Accesos a internet, residenciales y de organizaciones por tipo de conexión. Total del país, según provincia. Enero 2015 - marzo 2022, INDEC.

图 1 阿根廷全国网络接入情况

- ① Informes técnicos, “Accesos a internet, residenciales y de organizaciones por tipo de conexión. Total del país, según provincia. Enero 2015 - marzo 2022”, INDEC.
- ② Conectar Igualdad, <https://www.argentina.gob.ar/educacion/conectarigualdad>.
- ③ Red Federal de Fibra Óptica, <https://www.argentina.gob.ar/jefatura/coordinacion-presupuestaria-y-planificacion-del-desarrollo/telecomunicaciones/conectar/red>.
- ④ 研究预测表明，到 2023 年，5G 将在阿根廷产生价值 3020 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分布在几个部门：制造业 570 亿美元，电子信息业 540 亿美元，服务业 540 亿美元等。Magali Schefer, “5G en Argentina: proyectan que generará un impacto económico de u\$s302 mil millones hasta 2035”, ámbito, <https://www.ambito.com/negocios/redes-5g/5g-argentina-proyectan-que-generara-un-impacto-economico-us302-mil-millones-2035-n5464920>.

正如前文提到的, 阿根廷的网络普及率和智能手机使用率在拉美地区都名列前茅, 互联网发展较为活跃,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 互联网经济在近十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 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 原本优越的国际贸易环境开始变得更为严峻, 使得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该国政府也不得不重视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正是因为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超越时空的互联互通, 有效地将全国乃至全球的商品流、信息流和资金流都通过平台联结起来, 极大地扩展了企业协调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带来效益。^① 因此, 当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时, 获得了相当多的融资支持以及发展先机, 平台交易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活跃的经济活动。^② 2021年, 国家通信公司 (el Ente Nacional de Comunicaciones) 负责人克劳迪奥·安布罗西尼 (Claudio Ambrosini) 宣称, 阿根廷在当年投资 139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发展计划, 确保阿根廷民众的互联网接入。总投资中包括来自普遍服务基金 (el Fondo de Servicio Universal) 的 30.5 亿美元分配给了中小企业和合作社经营, 以便它们能够扩大联网能力, 满足需求的增长; 还有 20 亿美元用于为全国的学校提供网络服务, 10 亿美元分配给了街道用于补贴民众的信息技术服务, 另有 5 亿美元用于工业园区进行 5G 技术搭建。^③

除此之外, 庞大的用户基础也是阿根廷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对阿根廷网络四大供应商 Movistar、Fibertel、Telecentro

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 程水英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49—50 页。

② 王勇、戎珂:《平台治理: 在线市场的设计、运营与监管》,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 第 46 页。

③ “El Gobierno invierte 13.900 millones de pesos para expandir Internet a todo el país”, Página 12, <https://www.pagina12.com.ar/342126-el-gobierno-invierte-13-900-millones-de-pesos-para-expandir->.

和 Claro 的调研中, 86% 的受访者表示“出于工作和学习的原因, 如果没有互联网, 他们就不可能渡过疫情难关”; 75% 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是“一项基本服务”; 73% 的受访者认为“该服务对于维持消费(经济)和就业至关重要”。同时, 在未受过教育人群中, 64.1% 的人在使用网络; 在完成中等教育的群体中, 这一比例上升到 89.4%; 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群体中, 这一比例达到 97.7%。在城乡结构上, 互联网在城乡地区的普及率是同时提升的。^① 对于企业而言, 这些坚定的网民基础对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为只有保证同网民群体的充足交往, 才能保证企业与民众之间的黏性, 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才能进行不断地积累和再生产。^② 与此同时, 阿根廷并不仅仅着眼于国内的网络用户群体, 政府还出台新的签证政策,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提供在阿根廷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机会。2021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 阿根廷首都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数字游民会议, 发言人包括了阿根廷重要的独角兽分类广告网站 OLX 创始人亚历克·奥克森福德(Alec Oxenford), 来自马威瑞克投资集团(Maverick Investor Group)的房地产企业家马特·鲍尔斯(Matt Bowles), 数字游民社区创立者罗萨娜·洛佩斯(Rosanna Lopes), 他们介绍了在阿根廷进入数字经济的工作机会和开展互联网相关活动的政策背景。^③ 这些优惠措施吸引了优秀的互联网经济从业者和寻求在新经济体中进行创业的群体, 将原本只是暂时驻足的“游客”, 转变为能为当地互联网平台经济进行贡献的社会资本。

① “La Argentina es el país con mayor penetración de internet en la región, según la Unesco”, *télam*, <https://www.telam.com.ar/notas/202201/581436-conectividad-internet-unesco.html>.

② 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2 期, 第 87—99、207 页。

③ “Buenos Aires to Host First ever Conference for Digital Nomads in Latin America”, Ciudad de Buenos Aires, <https://baglobal.buenosaires.gob.ar/en/buenos-aires-host-first-ever-conference-digital-nomads-latin-america-1557>.

以上所有来自技术、经济、社会和政策的发展支持都促进了阿根廷的互联网企业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在经济中大放异彩，动摇了传统企业的经济地位。2016年初^①，阿根廷有五个国内资本控制的平台在运营：Mercado Libre、Zolvers、Workana、Iguanafix 和 Nubelo。该年，阿根廷政府发生更迭，国内的经济政策出现变化，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特别是由于海外支付系统的灵活性，加速了新的外国投资流入现有的国内平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阿根廷国内新出现了七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其中包括一些全球领先的企业：Airbnb、Cabify、Uber、Glovo、Freelancer 等。到 2018 年，阿根廷的大多数平台都在传统领域运营，支持在物理空间中开展的活动，但必须符合运营的资格要求。此外，阿根廷还另有三个在虚拟空间中运行的平台：Workana、Freelancer 和 UpWork。这些平台吸引了具有技术或专业资格的工作者，尤其是来自设计、软件开发或翻译工作等领域，促进了独立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并增加了他们进入新市场的机会。总体而言，阿根廷互联网平台企业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包括电商服务、在线旅游服务、资金交易平台、金融贷款业务和软件开发等。它们的兴起均借助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展示了引入新技术和提高生产力的创新商业模式。但同时，它们也对阿根廷的工作体制、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监管框架等构成了挑战。^②

① 在 2003—2015 年的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期间，政府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使得整个阿根廷国家市场相对封闭，同时因为互联网经济彼时在阿根廷还不具规模，互联网平台企业体量小，又受制于紧张的政策，并未吸引到太多社会关注。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以及疫情期间民众对互联网经济的依赖加强，此类企业开始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② Javier Madariaga, Cesar Buenadicha, Erika Molina & Christoph Ernst, “Economy of Platforms and Employment: What is it Like to Work for an App in Argentina? Executive Summary”, CIPPEC-IDB-ILO, Buenos Aires, 2019.

表 1 阿根廷现有的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

经济类型	服务类型	行业类型	企业案例
按需经济	基于云的服务	自由职业	UpWork
			Freelancer
			Workana
	基于地点的服务	交通	Cabify
			Uber
			Didi
			BATaxi
		清洁、维修	Iguanafix
			Homesolutions
			Mi Gran Taller
			Zolvers
			DogHero
			GuauSurfing
		住宿	Airbnb
			Homeway
		外卖	Rappi
			Glovo
	PedidosYa		
	基于买卖活动的服务	零售	Mercado Libre
			OLX
LetGo			
Alamaula			
Tiendanube			
数字金融		Bitfarm	
		Ualá	
共享经济	虚拟产品服务	教育	Wikipedia
			Coursera
			Tutelius
			Cientópolis
			Redalye
			MiradaX
			Aleph
	实体产品服务	交通	Carpoolear
		住宿	CouchSurfing
	买卖服务	零售	OLX
LetGo			

数据来源：参考 Javier Madariaga, Cesar Buenadicha, Erika Molina & Christoph Ernst, “Economy of Platforms and Employment: What is it Like to Work for an App in Argentina? Executive Summary”, CIPPEC-IDB-ILO, Buenos Aires, 2019。

三、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政治影响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实际上代表着这部分社会力量的独立，使之获得了某种主体性的权力地位，具有了对社会中其他主体的支配性力量。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代表作中考察了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现象。她提出，在新技术、市场和政治三个变量的共同作用下，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而国家的权力则逐渐衰落，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最终将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而从事技术、服务、硬软件供应的企业最终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发展机会和更具主导性的权力。^①

（一）公共治理主体的变更

在传统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中，政府处于公共服务的中心。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政府治理的一元结构造成冲击，国家权威（此处指代政府）与非国家权威（此处指代企业）之间更加相互依赖，也要求它们之间相互协调。^②互联网平台企业凭借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手段可以更有效地聚合各类资讯，应对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和变化，陆续接管了大量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政府中的一些行政部门此前是政策执行的核心，但它们在公共治理方面的能力和主体性地位也慢慢地逐步被互联网平台企业弱化甚至被加速替代，政府的组织形态也将随之改变。^③虽然政府在理论上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③ 樊鹏：《利维坦遭遇独角兽：新技术的政治影响》，《文化纵横》2018 年第 4 期，第 134—141 页。

是提供公共服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首要组织，但是在新技术革命之后，政府实现公共治理和服务的技术路线和工具将更多依赖于大数据的系统和平台。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自己打造的公共空间中扮演着一个协调资源配置、创新组织方式的公共治理主体的角色，行使着类似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例如，对于社会安全监控办法的实施，许多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追踪，提供监察系统，帮助政府快速定位犯罪地点、时间、人员，从而保障高效地解决威胁社会安全的问题。^①另外，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强势的发展进程中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疫情冲击之下，传统企业的经济拉动能力不足，但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在平台经济中释出，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使社会管理智能化。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带动了服务经济的腾飞。此外，大数据时代，一切信息都能以代码的形式存在，在政府管理的广泛领域内，对于人口信息和各类事务的登记服务，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云计算功能结合区块链技术加以提供。随着这种新技术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平台企业所掌控的动态大数据可以覆盖甚至囊括政府所享有的数据，并可以在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面对政府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补充和优化。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在公共服务、政府决策与社会智治中发挥有效作用。^②

（二）权力运行条件的改变

国家是在一定疆域范围内肯定了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

① Hossein Hassani, Xu Huang, Emmanuel S. Silva & Mansi Ghodsi, “A Review of Data Mining Applications in Crim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The ASA Data Science Journal*, Vol. 9, No. 3, 2016, pp. 139-154.

② 王伟玲：《我国数字政府顶层设计的理念辨析与实践指向》，《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6期，第40—50页。

类共同体^①，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规范权力运行的条件。然而，新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出现，改变了国家权力运行的条件，对国家政权和政府职能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平台是在虚拟概念上聚集（cluster）数据信息和生产要素，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对所掌控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运用，其实可以发挥类似传统暴力机制的功能，对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条件进行改变，在传统权力结构中注入了一种导致内部持续紧张的信息权力。^②同时，因为互联网极高的渗透率，个体层面的数据可以轻易地被平台捕捉到，不论是饮食偏好还是政治倾向，医疗数据还是行程管理，从数据的规模到信息的深度，互联网平台企业所能掌握的数据都远超政府的传统统计数据。因此，当互联网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服务时，决定交易的节奏和方向的既不是服务提供方也不是服务获取方，而是平台企业；通过对获得的大数据信息进行云计算分析，它们能够更为创新地，或者说更为精准地推出个体或机构更希望得到的反馈^③，同时支配着发生交易的诸方。此时，平台企业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第三方平台，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信息权力的拥有者。现今，互联网、数据、数字生活已经从各个方面支配着我们的生活，个体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每个人都被强制拽入这一历史前进的轨道上。^④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对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权力的运行模式也带来了冲击。

许多国家政权部门顺应了这一趋势，将互联网平台技术引入到内部，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例如，将原本属于政

①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②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第15—19页。

③ Arho Suominen & Arash Hajikhani, "Research Themes in Big Data Analytics for Policymaking: Insights From a Mixed-Methods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Policy & Internet*, Vol. 13, No. 4, 2021, pp. 464-484.

④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37—44页。

府的公共权力部分地让渡出去，由互联网平台企业来承担，同时接受民众的审查，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行为方式和观念。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种“被赋予”权力的背景下，逐步拥有日益壮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社会的权力中心。^①最为深层次的影响，是对权力流程的再造和权力运行条件的改变。互联网平台所掌握的数据、所运用的计算方式深度介入到权力运行中，某些原本专属于政府不同权力部门的垄断性事务都被互联网平台企业具象化为一般数据^②，存于云计算的装置中自行生成和演化，变为一种独立于主体意识的存在，如此，权力部门就很难再从主体的层面来把握、管控或协调这些对象。

（三）新政治空间的产生

互联网的存在使得政治空间的边界变得十分模糊。传统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创造和控制不同的政治空间来获得存在感和权威的，传统政治空间的边界是明晰的，个体或组织都被划分在不同的行政分区中，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移动互联是新政治空间的催生因素，互联互通的状态打破了传统行政权力控制的范围和管制界限，使得政府的管制能力相对欠缺，原本适用的政治权力运行规则也在某些情况下失效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创造出一种政治空间，这种空间是无形、无组织的，或者说是有组织但组织效能低于传统政治的，尽管需要接受一定的来自政府的监管，但这一政治空间在某些领域仍然被视为是全新的、无边界的。^③对于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而言，在国家内部，它们基于自己的经济生态系统，创造出一

① 刘金河：《权力流散：平台崛起与社会结构变迁》，《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第118—132、179页。

②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37—44页。

③ 樊鹏：《利维坦遭遇独角兽：新技术的政治影响》，《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第134—141页。

个有别于政府控制下的政治空间；在国际社会中，它们拥有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调度能力，挑战了基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力。^①

新空间正在不断扩展，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出现了许多自主空间。例如现有的一些电子支付、电子借贷平台，可以通过更为便捷、快速的方式向民众提供资金，而不接受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督和管制。平台企业制定的金融风险判断标准和借贷流程相当于立法和政策，按照资金使用守则对平台上的电子账户进行销户和限制交易的活动相当于行政执法，而对侵犯平台企业的电子借贷系统行为的仲裁则类似于政府公权力中的司法裁判权。这些类似的新建立的政治空间拥有自己的运行环境和准则，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越过传统的政治空间自行运转，并对传统的政治实体造成影响。

四、阿根廷“自由市场”的政治影响

在所有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中，诞生于拉美，又在拉美拥有广泛市场的是来自阿根廷的企业——电商巨头自由市场（西班牙语：Mercado Libre）。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简称：新冠）的突袭造成全球经济萎缩，失业人群陡增，投融资环境紧张，也使得各大企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但与此同时，线上购物、在线办公、医疗健康等相关领域异军突起，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各国政府呼吁大众居家生活和办公后，许多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大批量地涌入线上，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因此迎来了飙升式发展。自由市场也相应地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②，线上购物的习惯扩展到了拉美的大多数家

① 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76页。

② 自由市场的月活跃用户在2019年底的企业报告中为7400万人，到2020年底这一数值增加至1.3亿人，新注册用户在一周内增加了近5800万人。相关内容参见“MercadoLibre, Inc. Reports Fourth Quarter 2020 Financial Results”，<https://investor.mercadolibre.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ercadolibre-inc-reports-fourth-quarter-2020-financial-results>。

庭。在拉美，47%的网络购物者都会选择本地平台企业自由市场，只有17%的用户会选择美国电商亚马逊（Amazon）。^①

自由市场创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阿根廷的维森特洛佩斯（Vicente López）。公司创始人马科斯·加尔佩林（Marcos Galperin）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将美国电商的运营模式在阿根廷本土化，并获得了学校投资人的首笔资助，开启了创业之路。到1999年10月，自由市场在推出不到三个月后，在阿根廷拥有超过1.5万名用户，完成了总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6000次交易。^②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加尔佩林和他的团队不满足于仅在阿根廷和巴西开展业务，自由市场的业务扩展到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③到2006年，该网站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市场的电子商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了先进的在线交易环境，促进了拉丁美洲电子商务社区的发展。^④自由市场于2007年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至当年年底该企业已经完成年收入5000万美元的目标。^⑤自2013年开始，自由市场迅速地扩大商业版图，完成对多家拉美商业公司的并购，包括2013年收购出版集团Neosur，2014年兼并地产公

① “Top LatAm E-Commerce Sites: 47.4% of Latin American Internet Users Buy on MercadoLibre, Only 16.6% Prefer Amazon”, portada, <https://www.portada-online.com/latest-news/top-latam-e-commerce-sites-47-4-of-latin-american-internet-users-buy-on-mercadolibre-only-16-6-prefer-amazon/>.

② 但阿根廷2001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给该企业提供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同时阿根廷彼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并不完善，能接入互联网的家庭有限，该企业在阿根廷政治领域并没有获得关注。María Eugenia Estenssoro & Silvia Naishtat, *Argentina Innovadora*,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pp. 65-73.

③ María Eugenia Estenssoro & Silvia Naishtat, *Argentina Innovadora*,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p. 74.

④ Sonia M. Filipetto & Gabriela A. Pontoni, “Relaciones laborales y economía de plataformas. El caso de MercadoLibre en la Argentina reciente”, *realidad económica*, Vol. 50, No. 335, 2020, pp. 15-44.

⑤ William Barnett, Gary Mekikian & Christy Johnson, “The Rise of Mercado Libre”, Stanford GSB case No. IB109, 2020, <https://www.gsb.stanford.edu/faculty-research/case-studies/rise-mercado-libre>.

司 Portal Inmobiliario, 2015 年兼并和收购巴西和阿根廷的多家电商服务公司, 例如 KPL、Dabee 等, 2016 年收购软件开发公司 Monits 和 Axado。^①

阿根廷中右翼党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 (Mauricio Macri) 在其执政期间 (2015—2019), 通过对企业和市场的支持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使阿根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也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2017 年 3 月 28 日, 阿根廷国会通过了新的企业法, 这部新法包括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创业和投资活动的措施。^②2019 年 5 月 22 日, 阿根廷通过了《促进知识经济法》(Régimen de Promoción de 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旨在推动软件、计算机和数字服务行业的开发、建设和推广, 主要支持利用计算知识和信息数字化的经济活动, 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③此时, 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对互联网经济进行资源倾斜, 使得政府和市场能够协同互补, 发挥最大的效用, 促进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良性发展。^④2016 年, 该公司的每季

① 自由市场自 2005 年起就开启了并购之路, 同年收购其在拉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电子商务平台 DeRemate, 自 2013 年开始其并购操作变得更为密集。Sebatian Catalano, *Los nuevos reyes argentinos: Las increíbles historias de Mercado Libre, Globant, Despegar y OLX*, Buenos Aires: PAIDÓS, 2017, pp. 21-68.

②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第一, 为阿根廷的公司提供了快速注册的通道, 允许新公司在 24 小时内通过互联网以简化的商业实体 (Sociedad por Acciones Simplificada, SAS) 模式开展业务, 这为许多依赖互联网生存的小微企业打开商业版图和实现潜在增长提供了便利; 第二, 给投资者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 鼓励他们开展更具有挑战性的投资行为, 对于选择投资较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者, 他们可以获得最高达 85% 的免税额度, 以引导企业前往不发达地区进行市场调研和商业开发; 第三, 政府支持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种子基金公司 (FONDCE), 为不同的项目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实现新的项目孵化目标。另外, 还允许全国各地的企业家通过众筹平台来获得项目的投资, 这样能更好地集中社会资源, 促进市场的流动性。相关内容参见 Ley 27 349, Congreso de la Nación Argentina, <https://www.argentina.gob.ar/normativa/nacional/ley-27349-273567/normas-modifica>。

③ 该法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优惠的税收措施, 具体包括: 受益企业在法律适用期间保持税收不增长的稳定状态, 同时, 减少和退还部分雇主缴款, 以及实现所得税税率降低至 15%。相关内容参见 Ley 27 506, Congreso de la Nación Argentina, <https://www.argentina.gob.ar/normativa/nacional/ley-27506-324101>。

④ 杨典:《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第 30—35、125 页。

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19%、4% 和 4%^①；而在 2017 年，受益于政府优待，同比增长率分别提升至 48%、30%、30% 和 42%^②。2021 年，该公司的月活跃用户达到 1.3 亿人，通过电子支付平台全年完成总额为 773 亿美元的支付操作，售出的商品超过 10 亿件。^③ 这为该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扩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该企业参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如今，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电子商务平台 Mercado Libre、电子支付平台 Mercado Pago、电子借贷平台 Mercado Crédito、商铺服务平台 Mercado Shops、物流运输平台 Mercado Envios、传媒出版平台 Mercado Publicidad，涉及多个领域和产业，为其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自由市场的快速且全面的发展将自身的影响力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也将其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群体中。在阿根廷，自由市场发展至今已经拥有了影响政治的充足资本，该平台企业逐渐参与到对社会的公共治理中，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和创新的运行准则来改善社会发展。

（一）参与公共治理

自由市场在新冠疫情期间真正地更为普遍和广泛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群体。该企业近年来积极参与公共治理，在就业服务和公共教育等事务方面都有正面表现。

阿根廷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 月 20 日宣布全国实行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如非必要的生活采购不得在公

① 以美元为计量单位。参见“MercadoLibre, Inc. Reports: Fourth Quarter and Full Year 2016 Financial Results”, <http://investor.mercadolibre.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ercadolibre-inc-reports-fourth-quarter-and-full-year-2016>。

② 以美元为计量单位。参见“MercadoLibre, Inc. Reports Fourth Quarter and Full Year 2017 Financial Results”, <http://investor.mercadolibre.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ercadolibre-inc-reports-fourth-quarter-and-full-year-2017>。

③ “MercadoLibre, Inc. Reports Fourth Quarter 2021 Financial Results”, <https://investor.mercadolibre.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ercadolibre-inc-reports-fourth-quarter-2021-financial-results>。

共区域逗留，并且对非阿根廷本地居民关闭边境 15 天。^①这一政策确实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确诊病例的增加，但也使实体经济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关闭国境的政策也使原本的跨国经济联系被削弱。居民们一方面由于政府的高压隔离政策而减少外出，另一方面也因畏惧外在的病毒风险而主动选择居家。不论是出于哪一方面的考量而作出的选择，居民们发现通过线上购物来满足日常所需是当下最合理的生活方式。因此，阿根廷的互联网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发展，自由市场在此时作为拉美最大的电商平台，也得到了阿根廷乃至拉美人民的极大重视并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互联网平台上的用户因此大量且快速地集聚，使得平台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阿根廷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在非正式部门讨生活，或从事自由职业。^②疫情摧毁了非正式经济的生存空间，许多人在疫情期间要依靠政府现金转移支付获得补贴，但这些钱远不足以弥补损失的收入。但是，在自由市场提供的平台上，个体可以进行商业交易、寻找工作、完成信贷、发布广告、租售房产等。对商户来说，疫情期间如果没有自由市场，他们的日常生活想要正常运行是无法实现的。根据 2020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疫情之下阿根廷的中小企业加速了数字化转型以保证获得经济收入，每 10 家中小企业中有 7 家认为自由市场提供了足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他们在社会隔离情况下运作；每 10 家中小企业中有 6 家认为，在这种大流行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由市场，他们将无法继续经营。^③自由市场的平台提供了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就

① 其主要目的在于快速切断来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潜在传染源。相关内容参见“Argentina: There is No Economy Without Health”, WHO, July 29,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argentina-there-is-no-economy-without-health>.

② Matías Busso & Julián Messina (eds.), *The Inequality Crisi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t the Crossroads*,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2020, p. 98.

③ “Covid-19: la mitad de los cobros ya son digitales y 34.400 PyMEs empezaron a usar Mercado Pago”, <https://www.mercadolibre.com.ar/institucional/comunicamos/noticias/covid-19-cobros-digitales-34400-pymes>.

业服务部分，在外部冲击造成的社会失序情况下为社会提供稳定的公共秩序。同时，由于平台掌握了用户的信息，可以对资源进行调度，例如雇佣双方的需求匹配、买卖双方的意向交换等，在隔离期间为经济活动带来助推力。

在公共教育方面，自由市场发起多个项目，针对不同群体提供教育服务。例如，2018年自由市场联合承诺基金会（Fundación Compromiso）建立 Potrero Digital 平台，旨在为社会上年龄超过 16 周岁、难以获得优质教育并找到工作的人群提供免费线上培训，帮助他们释放工作潜力，同时在培训结束后，会将通过培训计划的人与在自由市场上进行销售并需要改进其数字战略的中小企业联系起来。^①2020年，自由市场发起助学计划（Entropía），为在阿根廷公立高中最后一年的学生提供免费的综合课程教学（STEM）^②，以帮助他们获得进入阿根廷国立科技大学（Universidad Tecnológica Nacional）的能力。当年，该项目有 286 名公立高中生毕业，其中超过 90% 的学生进入国立科技大学学习工程专业。2021年，有 815 名学生加入课程，最终完成课程的有 600 人。^③2021年，自由市场还推出了女性互联计划（Conectadas），主要针对拉美多个国家的 14 至 18 周岁的青少年女性，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让年轻女性与在自由市场工作的职业女性以及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和专家进行沉浸式的交流学习，旨在减少信息科技行业的性别差距。^④自由市场所提供的公共教育产品为阿根廷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以往难以获得的资源，并且以创新性的手段为阿根廷的经济转型和科技人才培养提供了后备力量，

① 自由市场提供的培训计划包括数字营销、网络编程、电子商务、平面设计和动画、云解决方案和虚幻引擎，每周学习时间为 9 到 12 个小时。相关内容参见 MercadoLibre, Inc., “Reporte de Impacto 2021”, p. 53.

② STEM 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教育概念，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由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4 个学科的英文单词的首字母拼成。

③ MercadoLibre, Inc., “Reporte de Impacto 2021”, p. 53.

④ MercadoLibre, Inc., “Reporte de Impacto 2021”, p. 51.

由此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公共行为的主体开始以多元的模式承担着公共治理的责任。^①

（二）创造信息权力

自由市场所能提供的贸易数据流和媒体信息流，成为该平台企业信息权力的来源，也重新塑造了权力的生产流程。

疫情期间，阿根廷的经济整体衰退严重。在自由市场和阿根廷省级政府的共同合作下，该互联网平台企业自2020年8月开通第一个省级官方商店（las Tiendas Oficiales de las provincias）^②，到2022年6月，已经有12个阿根廷省份^③在平台上开通此类商店。这一举措推动了阿根廷各个区域经济体中的350多家中小企业开展线上经济活动，其中65%的企业都是家庭生产，规模较小。^④自从平台开放省级官方商店后，只要是归属当地的企业，在通过资质审核后都可以免费加入各省的官方商店。这有助于原本只在区域内经营的门店在平台搜索引擎中具有更好的定位，可以配合并加强区域性经济发展。例如，2020年门多萨省就有2万家中小企业加入自由市场，并通过平台实现了商品订单数量上的翻倍；其中84%的中小企业还设法跳脱出对原有的只能通过政府提供的营销途径和推广手段以获取在当地的影响力这一模式的依赖，成功地将店内的产品销售到其他城市。^⑤原本省内的企业大多数只能依靠传统的宣传手段进行营销，如果依靠政府力

① 王华：《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25—28、33页。

② “Salta es la primera provincia argentina en contar con una tienda oficial en Mercado Libre”，El Gobierno de la Provincia de Salta，<https://www.salta.gov.ar/prensa/noticias/salta-es-la-primera-provincia-argentina-en-contar-con-una-tienda-oficial-en-mercado-libre-71925>。

③ 胡胡伊省、萨尔塔省、土库曼省、圣胡安省、科尔多瓦省、圣达菲省、门多萨省、内乌肯省、丘布特省、科连特斯省、卡塔马卡省和拉里奥哈省。

④ MercadoLibre, Inc., “Reporte de Impacto 2021”, p. 42.

⑤ “Mendoza ya tiene su propia tienda oficial en Mercado Libre para pymes y productores locales”，Prensa Gobierno de Mendoza，<https://www.mendoza.gov.ar/prensa/mendoza-ya-tiene-su-propia-tienda-oficial-en-mercado-libre-para-pymes-y-productores-locales/>。

量对各自的品牌进行推广，首先需要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对其产品进行评估，然后才能进一步获得政府的背书，从而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在自由市场的平台上建立省级官方商店后，之前分属不同省级政府权力部门的企业和产品进行选择垄断性事务被简化，对当地企业和商品的选择与推广都被放入由数据和市场决定的平台。平台会根据商品的被浏览量和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向商品的卖方和买方推送更为精准的数据服务。原来在政府主导下的省级企业和商品的营销和推广，经由平台的信息共享，变得更为便捷、公平。原本“企业-政府-消费者”的运行模式被打破，变成了“企业-消费者”的新模式，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由市场提供的平台成为重要的载体。同时，平台企业获得的消费者喜好数据、物流成本数据等，成为信息权力，可以改变市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①。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省级政府的宣传和推广不再是商业活动的主要依赖力量，平台企业提供的数据信息和联通全国的物流才是决定它们生存的关键。

同时，借助于自由市场提供的社区平台，大量信息可以在由自由市场搭建的专业平台上进行传播或在广大社会成员中横向地交流、沟通和评价，世界各地原本毫无关联的普通民众和机构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起社区合作，相互影响、相互帮助并建立信任。^②例如，自由市场发起的未来网络项目（Redes al Futuro）将有意向从事电子商务工作的青年吸引到阿根廷的马坦萨区（Matanza）完成技能学习，再在自由平台建立的社区中分享经验，“社区成员所交换的信息和思想等同于军事和经济力量”^③，由此成为信息权力的关键来源。^④又如女性互联计划将阿根廷全国乃至拉美全域的青少年女性和职业女性联结起

①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② 郎平：《互联网如何改变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6期，第90—121页。

③ Irene S. Wu, *Forging Trust Communities: How Technology Chang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MercadoLibre, Inc., “Reporte de Impacto 2021”, p. 52.

来，来自不同年龄层和社会背景的女性群体专门就行业和职场中的性别机会鸿沟进行探讨并发声。^①这种横向的平面化信息传播可以增加处于社会生活不同层面上的人们的沟通，对传统的媒体权力发起冲击，还能表现出互联网助燃的“蝴蝶效应”，使权力不再“集中于符号的控制者之手”^②。

（三）构建政治空间

自由市场在不断地发展中逐渐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金融生态系统，也相应地创造了一个单独的政治空间。

2017年自由市场推出了自己的电子借贷平台（Mercado Crédito），可针对个人和商户的需求提供贷款。根据市场调研，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买卖活动的商家中，可以获得传统的银行贷款的仅占18%，但是约有74%的商家有融资的需求。^③这主要是由于阿根廷传统银行的贷款流程手续繁杂，同时资质审核条件严格，许多在自由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中小企业或个人无法达到银行的资质标准，因而有时连最基础的起步资金都无法获得。自由市场开发了基于自身平台独特数据的专有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将其评级与传统金融机构区分开来，放贷条件仅以贷款方在平台的售卖收买记录为准，建立了一套替代传统银行借贷要求的新方案。自由市场提供的借贷平台为许多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和许多没有银行账户的普通民众提供了渡过疫情难关的“救命钱”。

该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的报告显示，自由市场电子借贷平台发放了超过17亿美元的贷款，几乎是2021年第一季度的三倍；截至3月底，有超过2270万用户将自己在自由市场电子支付平台上的余额

① MercadoLibre, Inc., “Reporte de Impacto 2021”, p. 51.

②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第15—19页。

③ Mercado Libre, “Fact Sheet: Financial Summary 2019 Highlights”, <http://investor.mercadolibre.com/static-files/9f074800-d0d5-4577-94e5-77f3044511c8>.

投资于自由市场电子基金平台（Mercado Fondo，具有类似支付宝的运行规则和功能）。^①对于阿根廷民众来说，借贷平台为许多原本被传统金融系统拒之在外的民众和机构提供了一次新的经济发展机会，补足了民众原本被剥夺的这部分经济权利。^②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阿根廷的居民储蓄率低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③，当民众不再将资金储存在银行而是放置在自由市场提供的基金平台时，实际上对银行在传统业务中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由市场出台的金融科技创新产品（Mercado Pago、Mercado Crédito、Mercado Fondo），在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标准之后，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只属于自由市场的政治空间。自由市场拟定其运行原则和规定，就如同国家行使立法权；自由市场对符合条件的民众和机构提供贷款，对违反平台借贷行为守则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惩罚与追责，是行使行政权；而对平台上的金融侵权行为提出仲裁则是进行司法裁判。由此，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在该领域行使了政府的职能，承接了部分政府权力，也消减了政府原有的三大权力。^④

五、结论与展望

自由市场在阿根廷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如何参与到对社会的公共治理中，为普遍存在的就业难、贷款难、教育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等问题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的。同时，平台通过所掌

① “Mercado Libre registra ingresos récord de USD 2,2 mil millones en el primer trimestre”, <https://www.mercadolibre.com.ar/institucional/comunicamos/noticias/reporte-ingresos-primer-trimestre-2022>.

② 能够跳脱传统的金融体系来为民众服务，这是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脱离了金融体系的监管和中央银行的监督，自由市场的借贷行为同样存在风险。

③ Ahorro bruto (% del PIB) - Argentina,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World, Banco Mundial.

④ 刘金河：《权力流散：平台崛起与社会结构变迁》，《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第118—132、179页。

握的信息资源来为个体或组织提供创新的生存选项，这挑战了政府主导的传统权力结构，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条件，也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空间。这些变化都提醒着阿根廷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相应的政治影响，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问题。

互联网平台企业大多数都是依赖互联网经济或者是高科技产业，这种商业模式的更新换代极快，各种技术迭代迅速，各类业态创新多元，因此在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有更高的概率会产生现象级事件。这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是一种现实的挑战。在过去，决策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和研究他们需要面对的特定对象和新现象，从而有能力找到合适有效的监管工具和应对手段。然而，如今的政府受到多中心权力结构的牵制，很难在立法、司法方面作出有效的即时反应，所以国家角色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往往是相对滞后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不再是传统的线性渐进式，而有可能是遵循快速螺旋型上升曲线或者是指数型增长曲线模式。面对这种可能造成国家与社会强烈冲突的潜在问题，各方都应该提前准备好应对措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整体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①对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可能无法深入到的微

① 在疫情期间，自由市场的迅速发展引起阿根廷政府的关注。阿根廷政府和邮政集团联手推出了类似的电商平台（Correo Compra）和相应的物流平台，以国家为支撑来同该互联网平台企业竞争线上市场份额，试图用替代和强制退市的手段将该互联网平台企业赶出互联网经济的大潮。另外，政府还纵容其他政治力量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破坏行为，阿根廷总工会领导人乌戈·莫亚诺（Hugo Moyano）带领工人占领自由市场的物流中转站，阻止货物发出，仅仅是因为该公司没有将物流部门的员工划分为装卸工人工种，进而向卡车工会缴纳会费。与此同时，阿根廷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塞尔吉奥·帕拉佐（Sergio Palazzo）也向该公司发难，认为他们有违规的现金交易经济活动，阿根廷央行需要对该公司的行为进行彻查。费尔南德斯政府领导下的阿根廷试图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国家强力来控制社会各部分的行为，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关系。最终引发了在阿根廷政府主导下的同自由市场的冲突，使得该企业将发展重心逐步地扩展和转移到巴西和墨西哥。在未来，如果阿根廷政府依旧采取这种非良性的互动方式，只会将阿根廷经济中此类稀少且优质的创新型企业越推越远。Martin Schorr, *El viejo y el nuevo poder económico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2021, pp. 169-198; Federico McDougall, “Correo Compras: irregularidades, quejas de usuarios y fuertes críticas al ‘Mercado Libre estatal’”, iProUP, October 28, 2022. (见下页)

观层面，国家要敢于抛弃利维坦式的做派，学会与社会、市场及企业进行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国家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一）鼓励协商合作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现有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模式，许多新兴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出现了。政府也必须意识到，作为传统垄断性的国家组织，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崭新技术环境和政治生活中，仅仅属于一个分散的权力系统的一部分。^①此时，如果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和强制为主的单向度的政府法规命令，并不能很好地协调多元的社会力量，尤其是拥有广泛信息权力的群体。在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折中主义范式中，学者们认为国家和社会处于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只有这种既有嵌入性又不抛弃自主性的关系才能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就认为国家与社会是协同发展的，国家权力的巩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要求政府对不可预知的风险有一定的操控能力；当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不足以胜任管理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时，国家的行政职能会被嵌套在社会中^②，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非常多见。

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短板主要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改变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和制造业，从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此时国家对企业的要求（demand）

（接上页）<https://www.iproup.com/economia-digital/17897-correo-compras-denuncias-contral-el-mercado-libre-estatal>; Esteban Lafuente, “Mercado Libre. Cuando la empresa más valiosa pelea con un socio del Gobierno”, *La Nación*, July 16, 2020, <https://www.lanacion.com.ar/economia/negocios/los-moyano-respaldo-politico-del-gobierno-nid2398873>; Asociación Bancaria, “Mercado Pago, Fintech, violencia y fraude”, *La Bancaria*, 10 Jul. 2019, <https://www.bancariasba.com.ar/2019/07/10/mercado-pago-fintech-violencia-y-fraude/>.

① 樊鹏：《新技术时代国家治理的新方向》，《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第80—83页。

②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提供支持 (support), 即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对政治系统提出各种要求、国家对政治系统赋予各种支持, 可以说国家与社会形成了比较稳定有序的输出、输入、再输入、再输出的过程, 形成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①; 同时对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 (mutual empowerment)^②, 将多元行为主体置于平等的地位, 以合作的态度来进行对话, 从而实现了国家能力的提升。建立一个上下、横纵互动的多维度治理体系, 采用对话交流、协商合作、建立认同的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实施和管理, 从而有效实现多元协调治理。

(二) 改进监管理念

在传统监管模式和架构下, 政府作为监管的主体, 主要针对线下市场进行监管。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出现, 衍生出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 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还是套用固有的监管手段, 以一种强国家模式的行为出现, 通过强制性的命令、指示和规定等, 对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进行直接干预。^③ 但是, 互联网经济的出现, 使得政府在微观层面的行政权力出现缺失和空白, 相应地政府会产生不满情绪, 这就会加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影响到政治稳定性。^④ 阿根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 以自由市场为例, 经历过与政府 (国家) 的蜜月期, 在疫情期间虽然表现较好, 社会责任感充足, 但是却没有能继续保持一种政府与社会相互赋权的双赢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和政府执政者之间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维的不同, 还因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扩张, 使得大量的个人层级和企

① David Easton,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Vol. 9, No. 3, 1957, pp. 383-400.

② Wang Xu, "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 Its Nature, Conditions, Mechanism, and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1, No. 2, 1999, pp. 231-249.

③ 王勇、冯骅:《平台经济的双重监管:私人监管和公共监管》,《经济学家》2017年第11期,第73—80页。

④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8-94.

业层级的微观交易行为不再受政府的控制，创造了一片政府权力无法触及和监管的空间。企业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呼吸”，但是却让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失去了监管的行动能力，来自利维坦的凝视被天然地阻隔了。当政府意识到监管有漏洞时，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往往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生态网络和坚实的顾客群体，使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变革难度加大。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有可能引发波及全社会并且后果难以估量的政治经济危机。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同样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以及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不管是催化剂还是主导者^①，都需要与时俱进地革新理念。政府部门需要以变革者的视角来规范监管行为，创新监管理念，改善监管的判定标准。政府部门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不能只是根据市场份额、市场影响力来定性，更应对企业所提供的社会总福利加以考量^②，采用更包容的标准实施监管措施。

（三）改善政治吸纳

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进一步崛起，其所具有的影响力会逐步渗透到政治领域，同时互联网平台企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也将不会再仅仅满足于政府简单的吸纳政策，而是更为希望能有空间参与到政策和规则的制定中，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的运行法则。如果采取传统的政治吸纳机制，可能一方面无法满足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政治诉求、无法实现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完善整合与吸纳；另一方面，现行的政治规则与新吸纳进入的企业之间也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考虑到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数据获取能力和计算分析能力，政府部门在构建政治吸纳规则时应当更多地倾听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意见。这

① 迪帕克·纳亚尔：《追赶：世界经济中得发展中国家》，周媛、桂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页。

② 王勇、冯骅：《平台经济的双重监管：私人监管和公共监管》，《经济学家》2017年第11期，第73—80页。

一群体可以参与规则的共同制定和政策工具的设计,积极采取行动对经济社会运行法则施加影响,探索建立政府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政治吸纳渠道、方式和广度,激励规范有序的公共参与。^①

这要求国家在政治制度层面完善社会在国家政治中的准入机制,可以部分地、适量地扩大社会参与的权力,在行政吸纳方面应当建立更具前瞻性的机制,需要探索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环境相适应的行政吸纳和政治参与机制。同时也不可放松政府正确的监管力度,需要更为快速地在司法、立法和行政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设计,从而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吸纳,灵活运用互联网平台企业群体的能力,将其从政府和国家的潜在对立方转变为可以进行建言献策的贡献方。

(责任编辑:周燕)

^① 李文钊、蔡长昆:《政治制度结构、社会资本与公共治理制度选择》,《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第43—54页。

The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in Argentina : The Case of Mercado Libre

Yuan Mengqi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s in social found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pport have led to a booming phase of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These new norms have affected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control model and political working regime, and challenged many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The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have changed the original subjects of public governance, affected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s of power operation, and created new political space. Regarding to these cha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se of Argentina's largest internet platform company Mercado Libre, and proposes that the state needs a new spirit of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encouraging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revolutionizing the concept of supervision, and improving political absorp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rnet Platfor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Political Power, Latin America